

中國發展對於台灣的影響

李大中

壹、前言

自改革開放二十餘年來，中國在綜合國力上已取得長足進展，不僅在對外關係方面，推展更具自信心的大國外交，在經濟的表現亦已累積顯著成果，除平均8%以上的年經濟成長率維持不墜外，一九九九年中國大陸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居世界第九名，至二〇〇二年，更超越美、德、日而躍升為全球第四位，在國內生產總額（GDP）的表現上，至二〇〇一年中國已成為僅次於美、日、德、英、法等國，成為世界第六位。本文擬就政治外交層面以及軍事安全等兩大層面，針對中國崛起的主要內涵、對台灣的意義以及我方的因應建議等部份，逐一說明之。

貳、中國崛起的意涵

一、政治外交層面：對亞太局勢的影響

自冷戰結束以來，亞太地區正進行權力重組，而「上升的中國、衰退的日本以及積弱不振的俄羅斯」為目前貼切的寫照，這其中自以中國的崛起對我方最為關鍵。在政治與國際層面上，美日同盟的未來以及美中關係的走向，是觀察台灣安全、中國之崛起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根本利益，最不容乎視的兩個座標。

就前者而言，眾所皆知，一九六〇年所修正的「美日安保條約」，因其爭議性的「遠東條款」，一九七二年中、日進行建交談判之際，曾引起北京方面的強烈質疑，自冷戰結束以來，由於前蘇聯的威脅暫時消失，轉型中的美、日安保體制，愈加明顯是以中國大陸為防範的對象，例如在一九九七年新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中，所謂的「周邊有事」概念，已暗示將台海納入美日安全保障的範圍內，而在二〇〇四年底日本所公佈的「防衛計劃綱領」中，首次將朝鮮半島與台灣海峽，列為充滿高度不確定因素的區域，指明對日本構成潛在威脅，在二〇〇五年二月，美、日外長與國防部長的「二加二」安全諮商會議中，華盛頓與東京更進一步宣佈台海安全為雙方所共同關切的利益，並將台灣海峽列為兩國的共同戰略目標。

相對而言，北京對於日本未來的動向，所最不樂見的局面包括下列三種：(1) 日本突破道德禁忌與法律約束，擁有核子武器；(2) 東京選擇不再依賴華盛頓，或是美國勢力完全撤出遠東，導致日本成為無人能駕馭的脫韁野馬；(3) 美國將日本、南韓以及台灣納入其在東亞地區「隱性的反中聯盟」成員，其中的最後一項，為中國大陸所最不能容忍的發展。由此可見北京戰略思維上的兩難與美國的微妙角色，一方面，基於區域主導地位的爭奪，並避免成為被美、日所共同圍堵的目標，中國希望盡量削弱華盛頓在東亞的影響力；但另一方面，中國憂慮東京

方面一旦失去美國的「保護管束」，將再度重蹈軍國主義的覆轍，屆時中國恐怕無法獨力壓制野心勃勃的武裝化日本。有鑒於此，如何巧妙介入，藉由平衡的美、中、日三角關係，維持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不僅是美國外交決策者所須面對的不變課題，更牽涉我方的戰略安全利益。

至於在美中關係的座標上，對台灣的影響更為重大，一九九三年柯林頓 (Bill Clinton) 總統上台後，在外交上奉行「交往與擴大」(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的基本方針，在亞太政策方面是採取「深化同盟」與「全面交往」並重的策略，前者確認美、日安保同盟的重要性；後者則強調與北京發展「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construct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目的是將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架構，誘導引此一全世界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逐步接納西方的制度與價值觀，包括對於人權觀念的服膺、國際規範的遵循以及市場經濟與民主制度的奉行等，但反對者認為華府與北京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無異於與虎謀皮，因為美中關係與美日關係，正如同天秤的左右兩端，美國難以輕易取得平衡，換言之，不可能兩者兼顧而面面俱到，由於美中關係升溫的潛台辭，就是美日同盟地位下滑的警訊，因此對中強硬派嚴厲批判此政策，認為它損害美國於亞太地區的根本利益。

小布希 (George W. Bush) 總統繼任之初，不僅在國際事務上奉行單邊主義的美國優勢主導，更視中國政策為美國亞太政策下的一環，其位階不應凌駕於美國亞太戰略的總體考量，因此一反民主黨人「以交往促成改變」與「和平演變」的浪漫期待，對北京的態度已明顯轉變，認為美國無必要為求顧全大局，而事事、委曲求全。至於在美中關係的定位上，則不再稱雙方為「建設性戰略夥伴」，而改以「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 的稱謂重新詮釋，直至中美軍機於二〇〇一年四月在海南島上空發生擦撞事件，小布希政府才將兩國關係的基調，調整為較不敏感的「建設性合作關係」(constructive and cooperative partnership)。九一一事件提供北京當局與華府改善關係的難得契機，雙方領導人均深切體認到，兩國在維持朝鮮半島局勢穩定以及打擊恐怖主義等議題方面，享有巨大的共同利益，而美國東亞國務助卿佐立克 (Robert Zollick) 於去年九月二十二日於「美中關係協會」的演講中，更以「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 的形容，重新定位美中關係。

僅管目前美國仍是鼓勵中國能於亞太區域，持續扮演建設性與穩定的正面角色，並冀望北京能夠選擇邁向政治民主化與自由市場的道路，但無可諱言，美國仍視中國為未來挑戰其領導地位的最有可能候選者，在某種意義上，無論「中國和平崛起」(China's peaceful rise) 或「中國威脅」(China threat) 的論述與預測何者成真，而中國是否為不滿國際現狀的修正主義者 (revisionist) 的辯論，孰佔上風，無論何黨執政，華府仍將對北京保持警戒的戰略態勢。

另一方面，對於中國大陸的第四代領導人而言，僅管「和平崛起」、「堅持防禦性國防政策」、「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永不搞擴張」與「永不稱霸」

為其對外宣示的戰略主軸，但在北京的主觀認知方面，華府政壇、媒體與學術界中的新保守派在中國威脅論上的推波助瀾，對於美國的主流民意已產生深遠影響，那就是中國正靜悄悄的取代前蘇聯，成為美國新冷戰思惟下的頭號假想敵，加上棘手的台灣問題向來為美、中爭執的引信，一旦失控，極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最悲觀的看法是最終雙方難以避免兵戎相見，即使鄧小平所揭示的對美與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在於「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善於守拙、決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等方針，但北京並沒有把握在未來，能夠完全排除大國衝突的可能性。

二、安全軍事層面：對台威脅持續升高

除國防經費的逐年成長外，正如同五角大廈於今年二月所公佈的《**四年期國防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中所指出，中國大陸的軍力擴張已使區域的軍事均勢面臨失衡的危險。¹的確，對岸自一九九〇年代初以來即加速進行軍事現代化的進程，而最為我方所關注的，莫過於人民解放軍所積極鑽研的各式非常規(unconventional)、非傳統(untraditional)與超越一切界線(unlimited)的不對稱性戰法。近來，包括美國與台灣的戰略學者、我國防部以及美國五角大廈的研判，已將(1)有限度的軍事行動與武力使用以及(2)空中暨導彈攻擊，列為共軍未來最有可能的對台作戰方式，而美國於去年所發表之《**二〇〇五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軍力報告**》(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5)更已詳盡列舉可能發生之衝突想定，例如前者包括特種部隊滲透、對我方政、經、軍領導中樞進行斬首式攻擊、採取訊息戰(information warfare/IW)、電子戰(electronic warfare/EW)、宣傳戰與心理戰之交互運用，利用網軍破壞我政府單位的電腦系統，並透過不實的訊息散佈，瓦解台灣軍民的抵抗意志；而後者是以各式彈道飛彈與巡弋飛彈，對台灣軍事設施(包括指、管、通、情、電、監、偵系統)，進行飽和性與遠距離之外科手術式精準式打擊，即所謂的癱瘓戰與點穴戰等不對稱性戰法。²

在解放軍的戰略指導原則方面，「奪取而非殲滅台灣」、「佔領而非摧毀台灣」以及「控制而非掏空台灣」可謂其核心精髓；而在制約的因素方面，北京方面最為顧忌的是台海衝突引發國際勢力的介入，因此攻台作戰不論是在軍事與政治的意義上，都必須界定於「國內與境內」事務，並能控制戰場於局部，限制衝突的範圍為台灣本島與台海地區，強調首戰即是決戰，避免因戰事的延宕擴大，予以美、日等國干預的任何可趁之機；而在指導原則方面，基於兩岸綜合國力巨大差距的事實，中共強調攻心為上，瓦解台灣軍民的抵抗意志，達成「不戰而降」與

¹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accessed March 1, 2006); available from <http://www.defenselink.mil/qdr/report/Report20060203.pdf>.

²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Y 2005 Report to Congress on PRC Military Power* (accessed July 21, 2005); available from <http://www.dod.mil/news/Jul2005/d20050719china.pdf>.

「兵不刃血」的最高境界；至於在特徵上，主要則是強調與過去的打一場與過去毛澤東式「人民戰爭」截然不同的新型態戰爭，即師法兩次波灣戰事以及科索沃軍事行動的經驗，並汲取南聯與伊拉克的失敗教訓。³ 總結來說，人民解放軍所重視的是以信息戰（訊息戰）為主軸的高科技戰爭，在攻台準備上，有別於過去的「焦土」與「打、封、登」戰略以及「最好要死人、要死人全死、盡量多死人」之口訣，如果發動侵台作戰，解放軍目前所希望進行的是「損小」、「效高」、「快打」與「速決」的現代化戰爭，在接敵原則方面，追求的目標是「最好別死人；要死死軍人；僅量少死人」。⁴ 因此，大陸軍方在「不對稱戰爭」、「超限戰」與「高科技與高訊息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之發展，是我方在建軍備戰以及對美軍購上所需考量的因素。

叁、結論與建議

1. 保持對國際政治之敏感度

應重視後冷戰時期亞太情勢的重要變遷，兩岸關係的發展，無論是和是戰、是改變抑或持續，很難不受外部條件制約，或自絕於國際環境之外，例如北京新一代領導人對於和平發展、經濟發展與台灣問題等目標的輕重權衡、美國如何看待與定義崛起中的中國、美國中國政策的選擇是採取合作與圍堵互用、建設性交往還是以防範壓制為主軸、華府在全球反恐戰爭與北韓核議題方面與北京的利益均需能否抵銷中國威脅論的力道、傳統的美日聯盟是能否持續，所有的面向不僅盤根錯節，更相互糾葛，均直接或間接影響我方的生存與安全，故政府重要對外決策的一舉一動，不應單就台灣內部的角度考量。

2. 強調「利害相依之價值同盟」

要讓美方確信，台灣與美國不僅是價值同盟，雙方在戰略利益上更是無比契合，但要將台美關係之定位，落實為真正之「利害相依的價值同盟」，便需要深刻理解美國的國家利益以及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換言之，應避免遷就國內的政治需要，進行外交上的過度操作，因為不斷衝撞美方底線的結果，必將消蝕自身得來不易之籌碼，一點一滴耗盡華府對台北的信任，更加窄化我方的政策迴旋空間。做為一個稱職的盟友，需要具備高度可預測性、體諒、信任以及忠誠等特質。

³ 鍾堅，「共軍高技術犯台戰爭如何以戰逼降」，*國防政策評論*（台北），第1期（2000年10月），頁145-147；鍾堅，「共軍犯台能力與作戰方式之研究（上）」，*尖端科技*（台北），第184期（1999年12月），頁31-33。

⁴ 鍾堅，「共軍高技術犯台戰爭如何以戰逼降」，頁146-147；鍾堅，「共軍犯台能力與作戰方式之研究（上）」，頁32-33。